

论两个共同体理念的理论契合与践行张力^{〔*〕}

张淑娟^{1,2}

(1. 大连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3;

2. 暨南大学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适应时代需要相继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两个共同体理念。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是中华民族自我意识在新形势下的再度彰显与主体性的重新确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是对人“类本质”的积极回应。二者的提出有共同的理论渊源和文化背景,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脉络、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等方面具有价值上的内在统一性。而从现代政治的权力来源、两个共同体理念的内在逻辑差异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曲折性等三个方面看,在实际践行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又存在巨大张力。国家作为“虚假的共同体”既是人类进入更高阶段的必经环节,也成为进入更高阶段的障碍。毫无疑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难能可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是对国家狭隘性的超越,是增进人类共同性和推进全球性政治单位构建的良好开端,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真正的共同体”之进阶之路。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体;“类本质”;“天下无外”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2.06.006

进入新时代以来,“共同体”成为出现频率极高的政治词汇,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其中两个最引人注目的政治概念,也因此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目前学术界对二者的分别研究较多,将二者联系起来探讨的研究较少,对二者理论一致性阐述的较多,对践行过程中张力论述的较少。周少青在分析二者共同思想渊源的基础上,指出两个共同体理念是对公民民族主义、世界公民主义和国家联盟理念的超越。^{〔1〕}

张三南认为两个共同体理念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对国内和世界民族问题的关切,都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新成果,具有内在关联和普遍意义。^{〔2〕}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先是从共同体的理论演变和实践价值入手,分析两个共同体理念在理论渊源和文化背景上的内在契合: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结构的框架里,家、国家进而天下的横向发展的伦理脉络,另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虚假的共同体”进而向“真正

作者简介:张淑娟,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暨南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百年历程与基本经验研究”(21AMZ002)的阶段研究成果。

的共同体”纵向演进的理论逻辑,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二者纵横交错的时空结点将上述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并结合现实需要创新发展,将统一战线理论运用于国际领域,相继提出两个共同体理念;而后从现实政治的权力来源、两个共同体理念生成的内在逻辑差异、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复杂性等方面,分析实际践行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巨大张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既是对国家狭隘性的超越,也是对国际政治日趋局部化的超越,是增进人类共同性和推进全球性政治单位构建的良好开端,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真正的共同体”之进阶之路。

一、“共同体”的理论演变与实践价值

本质而言,人类是以群体方式生存的动物,人类在群体生活中基于地域、生产方式和价值标准等方面的差异会形成不同利益与伦理取向的生活方式,从而形成各种不同类型的共同体,因此,共同体本身就是人类的生活实践,人类生活实践有多丰富,人类共同体的种类就有多丰富,共同体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体现人的社会性本质。人类对共同体的描述和研究也同样久远,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笔下的“城邦”,共同体在理论上经过复杂的演变过程,内涵日趋丰富,成为表述人类社会群体发展状态和趋势的重要概念。首先可以肯定共同体既是描述性概念也是规范性概念,^[3]兼具描述性和规范性的双重特征。事实上,这一词汇提出时就被寄予厚望,经过复杂的历史演变,始于地域与血缘,终于情感与归属,拟血缘成为共同体塑造的情感基础。

“共同体”的核心要素和情感内核是人,这一点既是学术界的共识也是讨论的起点。共同体既包含其成员的共同利益也包含共同价值,具有并能够提供纯粹的政治组织所不具有的精神力量,而共同情感是共同体被寄予厚望的基础。目前共同体研究主要呈现为两条路径:一是侧重情感的路径。除了承认共同体需要有共同的

地域之外,滕尼斯的“共同体”概念主要建立在血缘与情感之上,他认为在血缘和地域共同体基础上会分化成为精神共同体,精神共同体“构成一种真正属人的、最高级的共同体类型”。^[4]显然,与“社会”不同,“共同体是一个与契约和利益相对立的,关于出身、地位、习惯和气质的问题。”^[5]因此,“界定一个共同体的经验特质是由共同体渊源所赋予的。……而共同体却是机器的,它基于血缘、亲族、共居处和地域,以及一系列共同的态度、经验、情感和气质。”^[6]滕尼斯强调共同体成员之间具有排他的亲密无间、休戚与共的亲密关系,因此,共同体的成员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虽然涂尔干、韦伯、帕克、麦基佛等人都对“共同体”理论进行了发展,基于不同需要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观点,但都不否认情感因素在共同体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20世纪80年代共同体主义(又译“社群主义”)的兴起将共同体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潮,共同体主义同样承认情感因素在共同体中的核心作用,共同体包含共同的规范、价值和目标,每个成员都将个人奋斗目标和存在价值融入共同体的总目标中,将共同体的目标当成自己的奋斗目标。“个人责任的行使必须纳入社会责任的框架,因为我们的行为只有在兼顾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时才可获得最显著的效果。”^[7]

二是侧重物质基础的路径。马克思主义同样以人为核心讨论共同体的演变,但有别于上述理论脉络,马克思恩格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生产视角讨论共同体的演变,认为人自由全面发展要依赖“真正的共同体”才能最终实现,而这样的共同体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在人类发展的不同阶段,共同体形式存在差异,在“真正的共同体”发展阶段到来之前的共同体是“虚假的共同体”,国家就是虚假共同体的典型代表,在这样的共同体中,个人自由只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个人自由,对被统治阶级来说,国家是“虚幻的共同体”,是“新的桎梏”。马克思恩格斯将国家视为只代表部分人利益的虚假的共同体,同时认为“虚幻的共同体”存在又具

有必要性和必然性,“这些始终真正地同共同利益和虚幻的共同利益相对抗的特殊利益所进行的实际斗争,使得通过国家这种虚幻的‘普遍’利益来进行实际的干涉和约束成为必要。”^[8]而国家又是虚幻性质的共同体,“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形式。”^[9]近代以来,以民族原则建立的民族国家成为现代主权国家的主要形式,民族赋予国家这种“虚幻的共同体”以整体性,构建起与国家边界相一致的民族共同体,强调民族共同体的内聚力和包容性,从而部分遮蔽了现代国家的虚幻性,为现代国家提供合法性依据。民族国家分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方面揭露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本质,另一方面承认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时期典型的正常的国家形式,是资本主义的通例和“常规”,也是资本主义发展中必经的历史阶段,^[10]同时,认为无产阶级要实现全人类解放的目标,也要首先使自己上升为“统治的民族”,也就是说无论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都存在“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的分裂”,因此都属于向“真正的共同体”的过渡阶段。人类社会发展到高度发达阶段,才能进入“真正的共同体”时期,“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11]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个人是共同体的参与者和建设者,反过来又要依赖共同体才能实现个人全面发展的目标,“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12]不可否认,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个人对共同体同样有情感依赖并负有道德责任,“真正的共同体”也是伦理共同体和义务共同体,只有在双向互动中,人才能实现向“类本质”的真正回归。

以上论述表明共同体理论演变总体上呈现两条路径,无论哪条路径都承认共同体具有丰富

的情感基础和伦理期待,人与人、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国家、国家与国家直至全人类都是共在关系,是获得与付出互相交织的整体,而情感是共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同时,共同体本身没有明确的价值取向,仅表明具有某种共同性的人类群体,其具体内涵由前面的修饰词来决定,给人类的共同体想象提供了广阔空间。总之,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解释框架,包含地域和情感因素,呈现极强的理论弹性和适应性,并具有极强的解释力,从共同体演变的视角既可以解释人类历史,并能对当下提出合理的分析,对人类未来的发展寄予情感寄托和期许。总之,以人及人的情感为核心成为共同体理论具有超强的内生性基础、受到不同学术流派青睐的价值所在。

二、两个共同体理念在理论上的契合

人类命运共同体关注的是全人类的共同命运,中华民族共同体以打造牢不可破的各民族大家庭为己任,两个共同体理念的的关注点看似截然不同,事实上二者都是对人类不同层次生存状态的应然性表达,其提出有共同的理论渊源和文化背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等方面的理论脉络中能发现两个理念所包含的共同价值和情感寄托。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和伟大实践中,两个共同体理念既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响力的现代性表达,也是对人类共同体伦理价值和共同体本身的反思和重新定义。

1. 马克思主义从人的“类本质”和“真正的共同体”两个视角为两个共同体理念提供了双重逻辑

从整体上观察马克思主义,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最终的落脚点是对人类最终命运的高度关注,马克思主义从人的“类本质”和“真正的共同体”两个视角为两个共同体理念提供了理论遵循。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指出:人是类存在物。^[13]以此为基础,马克思在

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观察中展开对人类社会规律的研究,提出人类社会要经历三个阶段的观点:第一个阶段是群体本位阶段,即“人的依赖关系”阶段,在这一阶段社会生产能力有限,人类社会不同群体处于相对封闭与隔绝状态,存在严重的人身依附关系,这是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共同特征。第二个阶段是个体本位阶段,即“物的依赖关系”阶段,人逐渐从人身依附中摆脱出来并获得独立性,在资本推动和物质交换基础上世界史形成,世界成为紧密联系的整体。第三个阶段是“类主体本位”阶段,^[14]即“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15]马克思同时指出“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16]

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是中华民族自我意识在新形势下的再度彰显与主体性的重新确认。鸦片战争阻断了中华民族自然演化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从自在阶段逐渐发展到自为阶段,并在抗日战争时期实现整体自觉,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华民族获得根本性制度保障,并获得持续滋养,“中华民族的概念已经等同于国家”,^[17]自此,中华民族与现代国家全面结合。中国成为真正的民族国家参与到整个大的国际关系体系之中,与其他主权国家一样获得了相同的国家构成形式。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成为完全意义的主权国家,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个人获得独立性的新起点。在国内制度建设上贯彻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建立起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经济与政治制度,同时努力消除事实上的不平等。经过70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正在积极发展生产力,缩小区域差距、城乡差距等问题。从国际角度看,我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处理国家之间关系,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国际地位不断提高,日益走向国际舞台的中央。但是在国际关系领域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地区冲突不断出现,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粮食危机、疫情传播等共同性问题也层

出不穷。

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探讨了“真正的共同体”,而在实践中有两条路径,一条是资本主义的,一条是社会主义的,“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18]因此,我们距离“真正的共同体”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华民族发展的阶段性及国际社会的实际状况都表明人类处于个体本位向“类主体本位”的过渡阶段,但个体本位阶段同样需要共同体,即与现代国家相结合的民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对人“类本质”的积极回应,“类主体本位”已经逐渐从理论讨论变成现实需要。从“群体本位”到“个体本位”再到“类主体本位”,从“民族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再到“真正的共同体”都体现了人类社会螺旋式上升的自然过程。总之,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两个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提供了双重逻辑,两个共同体理念都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中找到各自的位置并阐明内在关系。

2. 中国传统文化的开放性和共同的价值关怀是两个共同体理念的共同文化背景

两个共同体理念特别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所以能在中国首先提出,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因素,为两个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提供了共同的思想文化背景。在两个共同体理念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化边界开放,二是文化的包容性。

第一,“天下观”与“大一统”政治思想的内在统一。“天下”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政治概念,是超越国家具有世界意义的政治表达,天下具有鲜明的主体性特征,将世界视为整体去思考问题,即主张“天下无外”“以天下为天下”“以天下观天下”。天下的边界是开放的,也就是意味着只有内部性没有外部性,将所有人、整个自然界

都纳入到天下之中,向世界万物发出邀请,这个世界只有需要化解的问题,没有敌人和需要征服的对象,天下是最大的共同体。虽然这一概念受限于当时的实践,具有局部性,但并不妨碍其在理论上先验地涵盖整个世界。与“天下”这一哲学命题相匹配的是“大一统”这一政治主张,学术界一般将“大一统”政治思想仅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思想基础。毫无疑问,这一政治思想是中国“多元一体”格局得以最终形成的历史基因,但同时,作为中国政治传统的一部分,这一政治思想的边界同样具有开放性。“大一统”只是表明不同时期各种政治力量对国家统一和“逐鹿中原”的热望与不懈追求,关注的焦点是中央权力及以中央权力为核心的辐射范围,但在边界问题上与“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人夷狄,则夷狄之”的文化开放性具有一致性,是向所有人群发出的邀约。这种政治关怀及传统并不会因为近代国际关系形成,进而具有清晰边界的“领土型国家”的全面诞生而消失,而是如同中国士大夫的道德理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一样,内化于中国历代政治家群体的政治理念之中,因此成为两个共同体理念特别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所以在中国能够提出的文化因素。

同时,承认中原文化的先进性,特别是儒家文化在整个中国传统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是主流意识形态,但并未将这种文化与某个民族身份绑定在一起,不论族属,只看德行。^[19]这种文化相对性认知显然具有重要的价值,一方面具有开放的心态,另一方面也更具有包容精神,也因此能承认、尊重和包容世界的多样性。

第二,承认和尊重多样性。“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不同的地理环境和生活方式会带来在风俗、习惯上的巨大差异,应该尊重而不是直接改变不同的风俗习惯,这是处理国内不同风俗习惯人群和民族关系的原则,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本身就彰显了文化的多样性基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兼容性和多样性的生动表达。

这样的理念在国际领域则表现为“以和为贵”“以和邦国”,在处理不同文明和国家之间关系时坚持“和而不同”的原则,因此,“和平、主权、普惠、共治”^[20]的基本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国际领域的当代表达,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样是具有伦理导向的善治理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21]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理念在当代世界的生动表达,也是中国文化在建设现代人类文明中的特殊贡献。这些观念本质上区别于西方世界的“以异化同”,“以异化同”理念形成的基础是相信西方文明与特定种族有必然联系,并强调其种族优越性和西方文明的天然优势,认为用西方的价值观念同化世界是他们的天然使命。

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胸怀天下,具有宽广的视野和胸襟,另一方面具有包容的态度和宽容的精神,从涵盖范围和处理不同文化的基本原则两个方面给两个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奠定了深厚的文化精神基础。总之,“家—国—天下”的传统政治框架从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由内而外、由下到上层层递进的逻辑中横向呈现两个共同体理念的内在一致性。

3. 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思想是两个共同体理念在理论上契合的关键性结点

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和影响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此过程中获得了一系列的宝贵经验,统一战线就是其中的经验之一。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和执政兴国的法宝。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念的应有之意,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念和基本价值在国际领域的逻辑扩展。统一战线所秉持的理念、逻辑和工作

机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生成和实践的重要基础,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1947年,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对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进行了概括,明确指出:“我们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22]两个联盟,即一个是工人阶级同农民阶级、广大知识分子及其他劳动者的联盟,主要是工农联盟;另一个是工人阶级同非劳动人民的联盟,主要是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扩展了两个联盟,明确提出“它已经发展成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联盟”。^[23]在新时期形成两个新的联盟,即劳动者与爱国者的联盟。在港澳台问题上,将两种社会制度纳入进来,实行“一国两制”。进入新时代,统一战线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至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概括了统一战线的功能:“统一战线是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是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法宝,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法宝”,^[24]并从推进实现全人类福祉的视角进一步扩大统一战线思想的适用范围,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伟大构想,呼吁世界各国应休戚与共,共同维护好人类的共同家园,并将求同存异、平等对话、协商共赢等统战原则应用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既是对以输出普世价值为己任的西方主要国家政治冷漠和政治无能的有力回应,也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稳步推进基础上对人“类本质”的高度关切和积极回应,是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类本质”和“真正的共同体”理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和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三个方面相结合并在新时代的合理外溢。两个共同体理念内外融通,内

含的基本价值也存在一致性。

承认多样性是两个共同体理念的共同价值。承认“天下无外”前提下的多样性是天下观的核心内涵之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思想的当代呈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基础是主权国家,追求的是不同国家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以“和而不同”为目标。“天下是一个可以容纳复数可能世界的世界(an inclusive world of possible worlds)。”^[25]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的主旨演讲回应了天下观这一内涵:“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下优劣之分。”^[26]因此,文明交流互鉴成为中国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在精神层面的基本原则。同样,在中华民族演进过程中所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正是在承认统一性的前提下保护多样性的结果。两个共同体理念都内含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共同价值。

两个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的政治话语,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以及百年政党在革命、改革和建设实践中积累起来的政治智慧,是对“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生动诠释。^[27]两个共同体理念在理论上的高度契合表明中国共产党在面临新形势时解决国内与国际问题的新思路和新战略,尤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经过百年奋斗,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光辉历程,逐步“超越后发国家的弱者心态”,^[28]另一方面也展示了中国领导人的国际视野和历史担当,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为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而奋斗的政党。

三、两个共同体理念的践行张力

两个共同体理念在理论上高度契合是从二

者提出的理论基础与文化环境的视角所作的知识论分析,是一种应然性表达,既不能代替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目标的漫长征程,也不能代替由主权国家所构成的国际社会的生存论困境。从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现代政治哲学的矫正和超越,但同时必须承认在实际践行过程中可能面临巨大的挑战与矛盾,准确理解和把握其蕴含的践行张力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部分以现代政治逻辑视角从三个方面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困境进行分析。

1. 现代政治的权力来源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动力不足

现代政治生成逻辑中权力有两个核心来源,一个是“个人”,一个是“国家”,而这两个概念都是具有清晰边界的政治单位,“个人权利定义了个人的边疆,主权定义了国家边界”。^[29]政治单位的边界实际上规定了政治事务的内部性与外部性,因此,当前政治逻辑的最大范围仅限于国家,国家服务于个人,国际政治附属并服务于国家,世界并没有获得主体性,只能是对象。现代政治主要围绕个人权利的保障、国家主权的建立与利益的维护展开,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寻求排他利益的最大化,私人利益优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优于人类共同利益。国家通过法律等制度性规定将个人之间的外部性变成内部问题,使个人权利问题得到部分解决,但为了激发个人的积极性,国家又利用市场机制的利益最大化来刺激个人进行残酷竞争,因此,“私人化浪潮”下极端个人主义愈演愈烈,个人利益的极端强调对国家合法性形成巨大冲击。20世纪80年代以来“共同体主义”的兴起也是民族国家合法性再造的重要方面,同时,利用现代“民族”依据生物而又超越生物的文化性特征,^[30]进一步强化国家的合法性与韧性也成为不二选择。

近代以来,一些国家为了实现国家利益,支配、平衡、遏制,制裁、干涉、结盟,甚至发动战争……,各种手段层出不穷。进入21世纪以来,

由于全球经济发展低迷,一些大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等单边主义策略,面对全球性问题推卸国际责任,甚至走上逆全球化的道路,将一己之利推向极致。现代政治导致全球性问题出现,却不能也不愿意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思想与策略,同样,由民族国家所构成的国际体系不仅丧失了对全球化的解释力,而且不断导致国际政治日趋局部化。总之,国家依然是权力的最大边界,超出国家范围外的世界成为权力的真空,不是权力的来源,现代政治的特点是从国家的视角去思考世界,而不是将世界作为主体从世界视角去思考世界,转变思考问题的视角是增进全人类福祉的首要问题。

近代以来,人的独立性获得与民族国家合法性的建立相互呼应,推动人类步入现代社会,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个人主义的泛滥和极端化现象,在国际领域同样出现将国家利益极端化的倾向,“现代化过程蕴含着尖锐和深刻的悖论,它是赢取和丧失、发展和代价、前进和后退乃至福祉和灾难的统一体。”^[31]中华民族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期,在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要避免在国内以及国际领域出现上述问题,在国际领域中国也有义务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提出两个共同体理念成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必然选择,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站在全人类共同福祉的视角上对人“类本质”的高度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行为主体是主权国家,直接解决的是国家命运问题,本质是不同国家和平发展、合作共赢。”^[32]虽然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主要是一国之事,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则是众国之事,需要各个国家的共识与不懈努力,但建设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路虽远,但风雨兼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就是迈出的第一步。

2. 两个共同体理念内在生成逻辑的差异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的现实挑战

如前所述,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国之

事,是国内逻辑;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多国之事,是国际逻辑。中华民族经过几千年的累积和沉淀在近代实现自觉,中华民族整体观念形成和确立,为中国现代主权国家的建立确立起基本原则。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华民族发展提供了政治保证,党的十九大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双重任务,显然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在新时代塑造出来的道德主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对中华民族本体的现实反映,不仅反映中华民族的现实状态,还反作用于中华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33]在这一理念引导下,积极推动中华民族成为凝聚力更强、包容性更大的共同体。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涵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维度多层次的总体性共同体样态,在深层次上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各民族的文化认同与价值持守是其核心凝聚方式。”^[34]而各民族的文化认同和价值持守是在千百年共同命运中,经过共同的政治坚守、频繁的经济往来和文化遗产而形成的,成员之间共同命运所致的密切关联并由此形成极高的“道德密度”(moral density)。^[35]总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关系性存在,需要各民族成员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领域密切交往交流,首先要实现各民族的自我认同和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各民族实现深度融合,并在此过程中形成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五个方面的一体性认同。

2012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其内涵不断丰富,核心内容是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具体包含五个方面: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安全上坚持对话解决争端,协商化解分歧,共同应对各种威胁;经济上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文化上尊重文化多样性,促进文明交流、加强文明互鉴,实现文明共存;生态上合作

应对气候变化,共同保护生态环境,绿色发展。上述主张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成”目标的描述,涵盖了经济、政治、安全、文化和生态五大领域,主权国家是实现上述目标的基本行为体。如前所述,上述目标达成就意味着人类要克服和超越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自然、本国与他国之间的各种藩篱和狭隘性,超越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可见,两个共同体理念内在生成逻辑上具有明显差异,这些差异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的现实挑战。

首先,二者逻辑方向上不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的终极追求是内聚力,以各民族“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为政治目标。从民族国家的视角看,人类命运共同体追求“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世界的目标显然是向外的,虽然从长远来看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但需要各个国家克制甚至让渡部分利益。

其次,两个共同体理念所揭橥和回应的问题并非在一个层面上。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指内容具有非对称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民族国家短视与狭隘的某种超越,人类命运共同体显然将共同体引入到更大的范围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加多元,涵盖的内容更广,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涉及各领域显然不是各主权国家国内各领域的简单延伸,而应该有另外一套各国共识基础上的行事规则。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所涉及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因为有国家强有力的支撑更为紧密,密度也更高。因此,在以民族国家为主要国际关系行为体的时代,国家利益依然是外交政策的主要依据,无形中会削弱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包含内在价值的现实功能。

3.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曲折性决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长期性与复杂性

如前所述,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是“虚假的共同体”,因为“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还有分裂”,当然要看到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

还有分裂”存在着本质区别。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是造成劳动异化的根本原因,也就造成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根本的对立,因此,资本主义国家“要将国家这种虚幻的‘普遍’利益”不断进行粉饰以掩盖其真实本质。而社会主义国家则在根本上保障了广大人民的主体地位和根本利益,但是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地域发展不平衡等客观因素限制,以及市场机制和雇佣劳动的普遍存在,必然也存在“不是自愿的社会分工”和劳动的异化。既然国家是“虚假的共同体”,其内部人与自身、与他人、与社会、与自然之间,不同群体、整体与部分都存在矛盾和利益的纷争与疏离,也就是说国家内部都有现实张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华民族共同体就是解决上述国家内部张力的方法之一。

国际关系是国内关系的派生和附庸,为了转移各自国家内部矛盾并维护国家利益,矛盾、冲突与算计是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基本状态,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民族国家作为基本单位的共同体,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其既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也可能成为解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力量。从实践上看,维护国家利益是国际交往的基本准则,也是现代国家对政治领导人的最基本要求,因此,民族国家对自身利益的维护和捍卫给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带来巨大张力。“当前我们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是,遭遇威胁整个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球性问题,却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全球性理念和手段。”^[36]“现代技术和资本的逻辑与现代政治的逻辑之间并不协调,现代技术和资本的发展需要通过全球合作而达到最大化,而现代政治却试图通过分裂世界而以帝国主义方式去支配世界。”^[37]正因为如此,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自然难能可贵。

同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光有理念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使其成为命运共同体的其他要素,如突如其来不能轻易逃离并持续很久的危机,共同体能够抵御危机的物质和组织资源,以

及维系共同体持续存在的精神化表征仪式等等。由于人类面对危机的情况不同,应对危机的实力、态度各不相同,达成共识难度较大,形成共同遵守的机制和惩戒措施难度更大,也就是说,在完善理念增加其可操作性的同时,更为关键的是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构建的途径和举措。总之,民族国家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而实现“真正的共同体”的必经阶段,为二者的实现奠定基础,同时也成为实现上述目标的巨大现实障碍。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困境恰恰反映了人类社会进步的每一步都十分艰难,是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的历史过程。

四、结 语

中华民族在近代实现自觉与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符号的认同、接纳及积极运用密不可分,中国共产党借助“民族”进行社会动员,激发最广泛的爱国主义,团结带领广大群众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又将中华民族与国家现代化建设相结合,发挥“中华民族”在社会动员、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等方面的凝聚功能,助力社会主义建设,为消除社会主义国家“虚假”的成分创造条件。上述努力本身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中华民族自我意识在新形势下的再度彰显与主体性的重新确认的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巨大成就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奠定了基础,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起到示范作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人类命运的高度关切,为人类和平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真正的共同体”的进阶之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定是包含人类全部成员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不断增进全人类共同性、全面呈现人“类本质”并重建人类世界主体性的共同体。在通往这一共同体的路上只涵盖部分成员、以一部分人利益和价值为基础的共同体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必经阶段,同时也会成为某种障碍。如何克服这些共同

体带来的障碍、超越这些共同体的狭隘性时刻考验着人类智慧。人类社会走到今天,已经编织成密不可分的关系网,虽然人类自身的狭隘造成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疏离,也出现了气候变化、粮食危机、恐怖主义泛滥、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传播等全球性问题,但是我们仍然期待全球性意识变革的到来,期待“自我中心被珍视关系取代”,期待各国将自身利益置于世界的普遍联系与交往中去看待,期待关系意识的来临,“以所有人为敌(all against all)”转变为“与所有人结盟(all with all)”,^[38]期待将所有外部性转变为内部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早日到来。

注释:

[1][36]周少青:《论两个共同体理念的世界意义》,《西北民族研究》2020年第2期。

[2]张三南:《“两个共同体理念”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学术界》2020年第1期。

[3]描述性概念指的是那些被认为客观且能显示其存在的“事实”,即指“是”什么。规范性概念指道德原则和道德理想,即那些应该(should)、本当(ought)或者必须(must)产生的东西。因此,规范性概念是用来促进和限制某种行为方式的。参见[英]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核心概念》,吴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3页。

[4][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张巍卓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87页。

[5][6][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问题研究所、南亚发展研究中心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43、143页。

[7][美]丹尼尔·A·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梅俊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09、110页。

[8][9][11][12][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4、164、199、199、165页。

[10]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理论室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列宁上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409、412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1页。

[14]高青海:《人类正在走向自觉的“类存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第1期。

[15][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7-108、108页。

[17]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19页。

[19]参见魏光奇:《选择与重构:近代中国精英的历史文化观》,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67、68页。

[2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41页。

[21][2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33、468页。

[22]《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57页。

[23]《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3页。

[24]习近平:《2015年5月18日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5月21日。

[25][29][37]赵汀阳:《天下的当代: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236、238、29、30页。

[27]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3页。

[28][30]张曙光:《“类哲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年第1期。

[31]侯才:《“中国梦”与“中国现代性”的塑造》,《理论视野》2013年第6期。

[32]陈曙光:《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真正的共同体”关系再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2年第1期。

[33]《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1年8月29日。

[34]邹广文:《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叙事结构》,《哲学研究》2021年第11期。

[35]Baehr Peter, “Social Extremity, Communities of Fate, and the Sociology of SAR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46, No. 2, 2005, pp. 179-211. 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认为:如果把人们的相互结合及其所产生的非常活跃的交换关系说成是动力密度或道德密度的话,那么分工的发展直接与这种密度成正比关系。参见[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214页。

[38][美]肯尼思·J. 格根:《关系性存在:超越自我与共同体》,杨莉萍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409页。

[责任编辑:刘姝媛]